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刘榜离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刘榜离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英]勃朗特 (Brontë, E.) 著; 刘榜离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5302-0508-0

I. 呼… II. ①勃… 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3763 号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本书根据 Penguin Books Ltd. 1963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HUXIAOSHANZHUANG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刘榜离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74000 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5302-0508-0

I·514 定价: 21.00 元 (精)









序

1954

语言，作为表达人类思想的媒介，由于社会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改变，甚至因社会风尚的不同，各个时期都会有所不同。将写成文字的语言与口语相比，这种语言的变革更为突出。尤其在表达人类灵魂的文学语言中，变动与差异特别明显。

拿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例，最早有林纾，后来有周瘦鹃、苏曼殊的译文，从那时起至今已经百年之久。在我年轻的时候，《巴黎茶花女遗事》、《血海翻波录》等一系列外国译作从个性解放的意义上打动了我。外国文学新鲜的句式、细腻的心理刻画、结构上悬念的运用、叙述的快节奏等等，如旋风一般使我为之一震。这些外国名著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限于文学，曾使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然而，毕竟我当年所读的译本使用的是那时的语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也许已经有些晦涩难懂了。甚至再后来的五四式的初期白话文，与今日通用的文字也已迥然不同。加之外国文学翻译者所运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因各人出生地及运用文字的风格不同而各有差异。所以当去年春尽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来向我征求出版一套重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意见，并要我写序时，我欣然同意。不过在答应的时候，我附了一个“但”字：

我要求出版社派熟谙外语的同志来做这项工作，或组织外力进行这些重译文字的审校工作。这不但可使重译本的质量得到保证，同时也不会因书稿质量问题而使我这个写序的人陷入严于责人而疏于律己的窘况，从而自打嘴巴。

我是个不拒绝重译的人。我以为如果严肃对待重译，则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以至最终出现“定本”也并非不可能。我认为一旦翻译质量得到保证，就可以杜绝当今有些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乱译、漏译等等破坏质量的现象发生，更不用提抄袭他人译作的问题了。同时也可使重译本得到读者的认可。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译本所用的语言符合当前的语言习惯，这样既可以承袭原来的汉语传统，同时还可以一改二三十年代那种硬译、死译的流弊，从而使当今更多的读者得以欣赏外国文学，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我很感谢编辑部的同人同意了我的要求。这样一件似乎很麻烦的事情，得到了共识和实施，这些文学作品因之得到重译的机会，质量得以提高，也许有一天会得到一些“定本”，这也不是非分之想。有人以为重译本太多了，会不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我想如果严把质量关，加之新读者的出现，这种“浪费”完全可以避免。中国出版物品种及数量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读者的行列，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很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目光远大，以重译本去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值得我们创作及翻译工作者欢欣鼓舞。

爰为序。

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的生平传略

人们曾一度认为，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名下的所有作品实际上均出自一人之手。对此讹误，我在《简·爱》第三版的卷首语里曾说过几句话予以否认，并试图进行纠正。那番话好像也没有普遍为人所信，所以现在趁《呼啸山庄》再版之时，有人明确建议我将真实情况加以说明。

我自己也的确感到，该是澄清与埃利斯和阿克顿这两个名字有关的模糊认识的时候了。这一小小的秘密以前曾经带来过某种无伤大雅的欢乐，现在它却兴味尽失，因为世事变迁，今非昔比了。于是，我便有责任对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作品的来龙去脉和原作者作一简短的解释。

大约在五年前，我和两个妹妹经过很长一段分离之后，又在家中重逢了。我们住在一个偏僻地区，其间的教育鲜有进展，因而我们也根本无意在家庭小圈子以外去寻求社会交往，只是姐妹相依为命，完全依靠自己、书本和学习来谋求欢乐，并消遣度日。从孩提时代起，我们所知的最令人振奋和最动人心魄的乐事莫过于文学创作了。先前我们常常相互传阅各自的作品，后来这种交流和协商的习惯中断了，因此对各自以后所取得的进展，相互间并不知晓。

1845年秋季的一天，我偶然发现了一卷诗稿，那是妹妹艾米莉的笔迹。由于我知道她能写诗且确实写过诗，所以自然也不觉得奇怪。但我看了诗稿之后，不禁感到十分惊讶：我深信这些并非一般的抒情诗，也根本不像女流之辈通常能写的诗



篇。在我看来，这些诗既简洁精练、富有朝气，又真挚坦诚。在我听来，它们也有一种独特的音韵——苍凉、哀婉而又令人振奋。

我妹妹艾米莉并非感情外露之人，她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即便是至亲至近之人，不经许可也不能泰然自若地擅自闯入。因此，其诗稿被我发现一事我就费了好几个小时唇舌，才得到了她的谅解，而使她相信这些诗值得发表，则花费了几天时间。但我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头脑里一定潜伏着崇高志向的火花，而我要不遗余力地将这点点火花引发展成熊熊火焰。

与此同时，我的小妹也不声不响地拿出了她自己的一些诗作，并且明确表示，既然艾米莉的诗给我带来了欢乐，我也许愿意看一看她的诗稿。我难免会成为一个怀有偏爱的鉴赏家，不过我还是觉得，她的这些诗也有其自身那种甜美而真挚的悲怆情调。

我们很早就梦想将来有一天成为作家。即便是在我们星离雨散、忙于工作之时，也从未放弃这一梦想，而此刻它又突然变得强烈而又坚韧，显出一种刚毅的特性来。我们商定将诗作编成一本小集子，如有可能便将其刊印出来。我们不喜欢个人扬名，于是便将真名隐去，采用了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这几个名字；之所以作出这种隐约其辞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对采用带有明显男性色彩的教名存有顾忌，而又不愿宣布自身是女人，因为——当时虽不怀疑我们的写作和思维方式并非所谓的“女人气的”——我们隐约感到，人们常常带着偏见看待女作家；我们已注意到，批评家有时为了惩罚如何动用人身攻击这一武器，而为了得到酬报又采用吹捧的手段，而吹捧并非真正的褒奖。

推出我们的这本小书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正如所预料的那

样，没有人需要我们，也没有人需要我们的诗篇。不过对此我们在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我们虽无这种亲身的体验，但却读到过他人的经历。最令人困惑的是，难以从我们所申请过的出版商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答复。在这一障碍的极大困扰下，我冒昧向爱丁堡的钱伯斯出版公司征求意见；他们也许忘却了这件事，可我却没有忘怀，因为从他们那里我收到了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简短但却是客气而又切实合理的答复。我们按其意见行事，最终取得了进展。

书印出来了，但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书中所有值得称道的则是埃利斯·贝尔的诗篇。我过去和现在都坚信这些诗作的价值，而这一信念的确未被多少好评所确认；尽管如此，我还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

失败并没有压垮我们：为了成功而努力奋斗，仅此就给生活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必须继续下去。我们每人开始着手小说创作：埃利斯·贝尔写出了《呼啸山庄》，阿克顿·贝尔完成了《阿格尼丝·格雷》，柯勒·贝尔也写了一篇一卷本的记叙文。这几部书稿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接连遭到各类出版商的拒绝；它们的命运常常是粗鲁无礼、令人屈辱的退稿。

《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终于被人接受了，但条件却多少令两位作者感到难堪；柯勒·贝尔的书稿仍四处碰壁，哪儿都找不到人接受，也没有人承认其中的价值，于是，某种令人心寒的绝望开始袭入他的心头。他怀着一种近乎无望的企盼又向一家出版社（史密斯—埃尔德公司）试探。没过多久来了一封信，这段间隔比他凭经验推算出的时间要短得多。他把信打开，意气消沉地以为会看到两行冷酷无望的文字，宣称史密斯—埃尔德公司“无意出版书稿”，但却从信封里抽出了长达两页的一封信，他颤抖着把信读完。出版公司出于商业原因

的确谢绝出版此书稿，但却以一种十分通情达理的态度和卓有见识的眼力，如此谦恭、如此体贴地谈论了书稿的优点和不足，以致这一拒绝可能比用一般言词表示的接受还令作者感到欣喜。信中还说，若是一部三卷本的作品，将会受到重视。

正当那部一卷本的小说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伦敦徘徊的时候，我一直在写《简·爱》，恰在那时书已接近尾声：三周之后我把书稿寄了出去；友好而又练达的人接受了它。这是在1847年9月之初，10月底之前书便印了出来，而我妹妹的作品《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数月来仍在另一家出版商手下蹉跎，还在印刷之中。

后来它们也终于问世了。批评家对它们并没有作出公正的评判。《呼啸山庄》中显示出的那种不甚成熟的但却是真正的才气几乎没有被人认识到；它的含义和本质为人们所误解，其作者的身份也被搞错；有人说它和《简·爱》同出于一枝笔下，是作者早期的拙劣的尝试之作。这是何等不公，又是何等严重的错误！起初我们对此一笑置之，可是现在我却深感痛惜。恐怕对此书的一种偏见也由此而产生：那位作者在一部成功之作的掩护下，试图将一部拙劣而粗糙的作品推出来，那他必定是在过分追求著书立说的次要而醒醒的效果，而对这一事业的纯真而崇高的价值置若罔闻。倘若评论家和公众真的相信这一点，那就难怪他们对这一骗子会存有鄙夷之见了。

然而人们决不要以为我把这些事情作为责难或抱怨的对象，我不敢这样做，对我妹妹的敬意也不允许我这样做。在她看来，任何这种怨天尤人的表现都是可耻而令人作呕的缺点。

批评的一般准则有个例外，承认这一例外是我的责任，同时我也以此为乐。一位对天才有着敏锐洞察力并与之有卓越同

感的作者^①看出了《呼啸山庄》的真实本质，同时也准确地观察到了作品的优点，指出了它的不足。评论家常常使我们想起聚集在“墙上的字”^②前的那群占星术士和预言家，他们认不出墙上的字，也无法作出解释。真正的先知具有卓越的精神，被赋予眼光、智慧和理解力，可以准确无误地读出一位有创见的人写出的“数算、用秤称、分开”^③（不管那人多么不成熟，多么缺乏修养、发展多么不平衡），能够满怀信心地说，“这就是它的释义”。当这位真正的先知最终到来时，我们有权利感到高兴。

然而，即使是我提到的那位作者对原作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以为我以前拒绝了这一荣誉（我把它视作荣誉）是故弄玄虚，这对我是不公正的。我可以向他保证，在此种乃至其他情况下，我都不屑于去故弄玄虚；我相信赋予我们的语言是为了把意思讲明白，而不是将其掩盖起来，令人感到虚伪而生疑。

阿克顿·贝尔创作的《怀尔德赫尔庄园的房客》也同样不受欢迎。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其主题的选择完全是一个错误，简直想象不出任何与作者的性格更加格格不入的主题了。虽然作出这一选择的动机是纯洁的，不过我以为仍稍稍有点病

① 参见1850年9月号《帕雷狄恩》（Palladium）杂志。——作者注

② 典出《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其王宫里大摆筵宴，款待众人。正值宴会达到高潮时，一只神秘的手忽然显现出来，在宴会厅的粉墙上写字。国王见状十分惊恐，遍招术士和预言家解释墙上的字的含义。他们个个面面相觑，竟无一人识得。“墙上的字”是凶兆，可解释为灭亡之前的预兆。——译者注

③ 即“墙上的字”。大意是说，上帝已经“数算”出巴比伦国的气数已尽，巴比伦王已被放在天秤上称出其亏欠，巴比伦国家要分裂，并分给米堤亚人和波斯人。——译者注

态。在她的一生中，长期以来她注视到近在身边的天资被误用、才华被滥用所产生的可怕结果；而她的秉性自然是含蓄、敏感、郁郁寡欢的。她所目睹的东西深深地溶入她的脑际，这害了她。她焦虑地思索着她的见闻，直到她觉得有责任将其详细地（当然是运用虚构的人物、事件和情景）再现出来，以供他人作前车之鉴。她极不喜欢自己的这项工作，但又要继续作下去。当与她辩论主题时，她禁不住在辩论中放纵自己，她必须诚实；决不可文过饰非、轻描淡写，或者讳莫如深。这种本意善良的决定带给她的是人们的曲解和责骂。对此她以温和而坚定的耐心承受下来，一如她惯常忍受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一样。她是一位虔诚而又注重实际的基督教徒，但是宗教的忧郁色彩却给她那无可指责的短暂一生蒙上了凄惨的阴影。

埃利斯和阿克顿两人在缺乏鼓励下一刻都没有让自己消沉下去，精力给了一人以勇气，忍耐力则使另一人得以坚持下来。她们都做好了再试一次的准备；而我也欣然觉得，她们内心的希望强烈，精力也十分充沛。但是一场巨变却渐渐来临：磨难袭来的那种景况，想来令人毛骨悚然，忆起则叫人痛断肝肠。在重任在肩、最为紧张激烈之时，两位耕耘者却在她们的劳作中倒了下去。

艾米莉妹妹首先染病。她的详细病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但要把这病情描述出来，不管是在内心回想还是诉诸文字，我都没有能力做到。她一生中干起面前的任何工作来从不磨磨蹭蹭，而此刻她也没有拖延。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正在匆匆地离开我们。她的身体虽然垮了下来，但精神却变得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坚强。日复一日，每当目睹她所遭受的磨难时，我都以惊奇而又爱怜的痛苦目光望着她。这样的情景我从未见过，而我确实从未见过在任何事情上能与她相匹敌的人。她

比男子汉还要坚强，比小孩子还要单纯，她的性格独一无二。突出的一点是，她对别人充满了同情，但对自己却毫不怜惜；精神毫不屈服于肉体；她那颤抖的手、失常的四肢和无神的双眼仍像健康时那样各司其职。站在旁边目睹此种惨状而又不敢规劝她，其痛苦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

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难熬的两个月痛苦地过去了，我们这位宝贝将要经受死亡的恐惧和痛苦的那一天也终于来到了。在我们目睹她的精力衰竭之时，她在我们心中也变得愈加珍贵了。待到那天行将结束时，艾米莉留给我们的只有她那具受尽结核病折磨的遗体。她于1848年12月19日与世长辞。

我们想这已经够了；但是这种想法却全然错了。她还没有被埋葬之前安妮便已染病。她下葬后不到两周，我们就得到了明确暗示：妹妹将步姐姐的后尘而去，我们有必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她跟姐姐走了同样一条路，她的步伐更加缓慢，而忍耐力却和姐姐的一样坚韧不拔。我说过她是一位宗教信徒，在那极其痛苦的历程中，她正是依赖所笃信的基督教教义才找到了支柱。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和最严峻的考验中，我亲眼目睹了宗教教义的作用，我必须出来作证，那些教义使她带着镇定自若的喜悦渡过了难关。她于1849年5月28日亡故。

对于她们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无法多说，也没有必要多说。从外表上看，她们是两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女子；道道地地的隐居生活使她们养成了孤僻的举止和习惯。在艾米莉的性格中，朴素纯真和勃勃活力这两个极端似乎相融并存，质朴无华的修养、天真无邪的情趣以及谦逊淳朴的外表下面蕴含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和一团火焰，这团火焰也许会激发智力，唤起英雄的才干；但是她却根本不谙处世之道；她的能力不适应生活的实际事务，分明属于她的权利她都捍卫不了，最合法的利



益她也不会去考虑。在她和这个世界之间始终都得有一位译员来沟通。她的意志缺少弹性，往往跟她的情趣相抵触。她宽宏大度，脾气却热烈而又易变；她的精神则毫不妥协。

安妮的性格比较温和柔弱；她缺乏姐姐那股力量，那团火焰和那种创造力，但她却具有自己的文静美德。长期的折磨、自我克制、沉思、理智、气质上的含而不露与寡言少语将她置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她的心灵，尤其是她的情感，像是用一种很少揭开的修女的面纱掩盖了起来。艾米莉和安妮两个都不是饱学之人；她们从不曾想过在其他智者的泉源旁边将自己的水桶装满；她们的写作始终是出于性情的冲动和直觉的支配，还出自她们那有限的经历中所观察到并得以积累起来的东西。我可以概括地说，对于陌生人而言，她们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肤浅的观察家来说，她们不足挂齿；然而对于那些和她们关系密切，对她们的一生都十分了解的人来说，她们是真正善良而确实了不起的人。

之所以写此传略，是因为我感到拂去她们墓碑上的灰尘、使她们的芳名不受玷污是一个神圣的责任。

柯勒·贝尔

(夏洛蒂·勃朗特)

1850年9月19日